

「苏区经济卫士」阮啸仙

组织肃贪“突击队”和清腐“轻骑队”

□ 陈春美 马晓敏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是早期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首任主任，被誉为“苏区经济卫士”。他就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阮啸仙。

“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

阮啸仙，1898年9月生于广东省东源县义合镇，1919年五四运动后参与领导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党初期的50多位党员之一，先后出席党的三大、五大和六大，1927年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央审计处处长。阮啸仙不仅是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而且还是历届农讲所的主要教员，与毛泽东、彭湃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33年11月，阮啸仙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辗转来到中央苏区。毛泽东亲切地向大家介绍道：“你们别看他长得斯斯文文，像个白面书生，他与彭湃一样，都是广东闻名的‘农头’。我在广州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阮啸仙也用客家话跟群众打招呼，说道：“自家人不讲两家话，我们就是为穷苦百姓办事的。”

1934年1月，阮啸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审计工作建章立制，组织起草了中央苏区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律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与审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健全预决算制度和会计制度。阮啸仙还牵头组建了严密的审计机构，除中央设审计委员会之外，省及中央直辖市执行委员会之下亦设审计委员会。同时，他对各级审计工作人员尤其是审核员，提出严格的选人用人要求。一方面，审计工作人员必须是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务会计知识，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年轻干部；另一方面，对审计人员制定“六不准”工作纪律，即：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在阮啸仙的努力和带领下，中央苏区审计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人负责、有人监督，逐步走上依法审计轨道。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苏大会”）上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之初，还有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消极怠工、奢侈浪费、贪污腐化，甚至有些还是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阮啸仙称之为“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绝对马虎不得！”于是，他与中央工农检察院密切配合，组织肃贪“突击队”和清腐“轻骑队”，三驻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深入各省、中央直属县、各事业单位和革命团体、国有企业进行审计监督，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审计风暴。阮啸仙遵循“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的原则，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严审细核，跟踪督办，相继查处了左祥云、唐仁达、熊仙璧、刘仕祥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初步彰显了国家审计声威，既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坚定决心，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试图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

阮啸仙要求审计工作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注重解决问题。他精心修改每一份审计总结报告，客观公正地揭露每一个问题，一针见血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的蔓延。针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极端困难、苏维埃政府机关和企业的贪污浪费等问题，阮啸仙提出裁减冗员，实行预决算，开展节约运动，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从此，国有企业从过去“不知道也不考察产品的成本，不知计算盈亏，有钱就用，没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到积极主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经中央审计委员会核查统计后显示，中央各部门不仅完成了4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而且还远超计划数达到了130万元以上。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指出：“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阮誉传岭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阮啸仙奉命留守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与项英、陈毅等一起，坚持游击斗争。面对敌我寡的严峻形势，阮啸仙毫不畏惧，沉着镇定，抱病部署突围工作。为适应战斗环境，他将部队化整为零，妥善安排好伤病员，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树立信心，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处处给敌人以打击，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和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3月6日，阮啸仙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率领第二支队突围人员，冲破粤敌之牛岭、马岭封锁线，突围至信丰县安恩乡（今信丰县安西镇）上途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胸部。他忍着剧痛，艰难地喘着气，对突围人员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就这样，阮啸仙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7岁。

陈毅在惊悉阮啸仙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壮烈牺牲的噩耗后，含痛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衰感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诗中“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等句，正是阮啸仙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阮啸仙主持中央审计委员会工作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审计活动，在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制度建设、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有益探索，通过审计实践为人民审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治国理政伟大预演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人民审计事业的发展。



“战”与“和”：黎明前的较量 ——宁夏解放纪念碑碑文敬读

□ 王 琼 马永钊



在贺兰雄魂与黄河古韵的包裹中，位于银川市西夏区的宁夏解放纪念碑，铭刻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所付出的鲜血和牺牲。纪念碑坐南向北，一尊横刀立马的战士塑像矗立于镂空的宁夏地图前，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突破国民党重重防线，最后赋予了这块土地新生与希望。东侧浮雕带按时间顺序以进军六盘、决战金灵、北渡黄河、欢庆入城四个场景反映了解放宁夏的主题。西侧浮雕带则按领域分类，从科技、工业、农牧业、养殖业等方面反映各方力量支援建设宁夏的主题。纪念碑南面镌刻的碑文如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独立自由，国民党政府却发动内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救人民于水火，挽家国之倾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九年七至九月，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的指挥下，兵分三路挺进宁夏。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与各族人民的

支持下，大军所至，势如破竹，连克十余城，马鸿逵部溃败而散。

九月十九日，爱国将领马鸿宾父子率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爱国民主人士郭南浦、孟宝山等受命赴银川转达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宁夏之诚意。九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与国民党宁夏军政界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在中宁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晚，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一九一师一部进驻银川，标志宁夏解放。

为铭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朽功绩，立宁夏解放纪念碑，勒石为记。

银川市人民政府立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寥寥几百字的碑文全景式刻画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人民解放战争的强大力量，立体化展现了毛泽东打拉并用，区别对待的斗争策略，史诗般记录了宁夏历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

宁夏解放与西北解放

1949年7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取得扶眉战役胜利，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序幕。此时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妄图依靠马步芳部和马鸿逵部扭转西北战局，积极策动“二马”与我军决战于平凉地区。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制定实施“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牵制胡宗南部于秦岭外，以人民解放军第一、二、十九兵团以及第六十二军，兵分三路，发起追歼“二马”的陇东战役。

7月29日，在陇东千里追击中，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下到达今固原地区的泾源，吹响了解放宁夏的战斗号角。历经固关战斗、任山河战斗，以及三关口、瓦亭之战，截至8月11日，先后解放了固原地区的泾源、固原、隆德、西吉、海原各县，迫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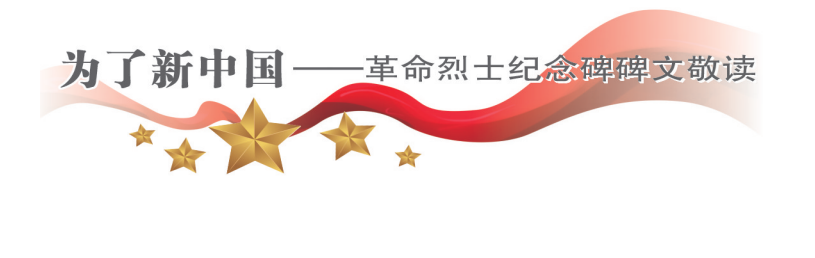
“二马”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形成了分割“二马”、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打开了指向兰州与宁夏的通道。其后，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向兰州方向攻击前进，和左、中两路大军密切配合，取得了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决战——兰州战役的胜利。

8月26日，兰州解放。经过5天的短暂休整和战前准备，第十九兵团又于9月2日挺进宁夏，发起了解放宁夏的总攻，所到之处势如破竹。9月19日，马鸿宾父子率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使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防守信心大为动摇。针对敌情变化，第十九兵团在当天集中优势兵力，发起金灵之战，取得了解放宁夏的关键胜局。国民党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则步其父亲马鸿逵后尘，乘机逃往重庆。在主帅出逃、走投无路的情势下，国民党宁夏部队发出求和通电。遵照彭德怀的复电指示，马鸿宾指定宁夏兵团前线总指挥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宁夏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为军政界代表，前往中宁与第十九兵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等人进行谈判。9月23日下午，《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订。9月26日，第十九兵团举行隆重的入城式，银川市各族各界两万多人夹道欢迎，塞上古城迎来新生。

纪念碑北面刻下的数字：“1949-7-29”“1949-9-23”“1949-9-26”，标注的就是历史进程中的这些重要时间节点。解放宁夏是解放大西北的重要一环，更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基石，就此翻开了宁夏历史新的篇章。

打拉并用解决宁夏问题

在解放宁夏过程中，始终坚持军



大名七师：直南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 马皓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坐落在直隶省南部大名县（今河北省大名县）的直隶省第七师范学校（简称大名七师），是一所闻名于直鲁豫一带的中等师范学校。学校1923年7月创建，1937年毁于日军侵略战火。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大名七师进步师生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为直南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直南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大名七师的筹建与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七师所在的大名地区，位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交界处。从民国初年起，这里一直是直隶南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此也是各路军阀互相争夺的阵地。

1923年7月，直隶省教育厅派遣谢台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委任其为首任校长。谢台臣早年深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因此，在建校伊始他就秉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更新教育观念，实施教育改革。他逐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文科教科书，决定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使学生接受了不少新思想。谢台臣的教育理念不仅为大名七师带来思想自由之风气，也为未来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8月，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的冯品毅从开封回到家乡大名，谢台臣听说后，毅然邀请冯品毅到七师任教，聘为英语教员。冯品毅来校后，利用学校思想自由的环境，大

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组织读书会，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刘大风、赵纪彬、裴梦协等10余人参加，向他们介绍《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等社会科学书籍。10月底，冯品毅在离开学校前夕，先后在学生中发展了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成润、吴益普5名共产党员。冯品毅走后，七师组建了党、团两个特别支部，刘大风任党支部书记，成润任团支部书记。从此大名七师有了中共党、团组织。

1927年1月，七师放寒假前，又发展了10余名党员，这批早期的学生党员在日后直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学校领导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校领导的入党意味着大名七师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学校，为直南地区开展党的活动提供了阵地。经过努力，到1930年，大名七师的党团员数量已经发展到100多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直南地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大名七师的学生党员利用放假或停课的时间走出校门，到周边地区发展党的组织。这一时期直南的大名、清丰、南乐、濮阳等15县都有他们的足迹，涉及直鲁豫三省。

在南乐县，刘大风等人在佛善村成立党支部，是南乐“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并且南乐县委的领导人主要是大名七师出来的党员。在濮阳县，刘汉生、王从吾、平杰三等在濮阳县辖区同时建立了3个基层党支部。

在清丰县，刘大风、赵纪彬二人在发展王启祥为党员后，建立了清丰县第一个党支部，1929年清丰县委成立后，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至1932年已发展了大批党员。在大名县，1929至1930年间，解蕴山、成润等同志担任了县委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组织下，大名七师周围的10多个村庄均开办了农民夜校，动员农民学习文化和进步思想。他们还派人深入农村，在全县60多个村庄发展了党员，建立支部20多个，党员人数增加到200余人。

此外，大名七师党员还在直南的长垣、南和、巨鹿、威县、沙河以及山东的濮县、范县、馆陶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种种活动，大名七师才会被称为“直南党组织发展的策源地”。

大名七师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发展基层党组织的同时，师生党员也在不断领导着地方斗争，影响很大。如党组织初创时，领导了以红枪会为代表的农民会道门组织，直接与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进行武装斗争。还创办农民夜校，提升群众思想觉悟。农民夜校使用的课本名为《农民夜校读本》，通过分析农民被剥削的来源，启发他们阶级斗争的觉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29年“双十节”当天，国民党县党部举行了庆祝活动，大名七师党组织利用此次活动时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宣传，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对进攻苏区”等口号，大批党团员走上街头，书写标语、散发传

单。这次行动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力，也极大震动了当地国民党组织。在当时，散发传单或下乡发动群众是很危险的事情，反动军警随时都会搜捕革命人士，因此大家在行动时就想出许多巧妙的办法。有一次几十位同学上街写标语，每人手里拿着几支粉笔，布满了整个街道，大家一齐动手、随写随走，一会儿功夫大街小巷便满是标语。等军警察觉后，同学们已绕道返校，有的装作行人在街上买东西，军警没办法，只得逼令群众尽快擦掉。

大名建有七师、十一中、五女师三所省属院校，虽然七师党组织发展迅速，但整个大名学生工作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五女师一直为落后乡绅控制。针对此情况，大名七师党组织以学生会的名义提出建立大名学生联合会，利用合法机构掩护党的活动，逐渐在其他两所学校建立了党组织。在其影响下，五女师的学生对封建落后教育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并于1929年11月爆发了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大名七师的党组织发挥学联作用，在城中号召各学校同学一致起来援助五女师。这次学生运动的规模是空前的，经过全体学生共同努力，五女师撤换校长，运动取得了胜利。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保定、石家庄等地，大名七师被迫南迁并最终停学。校园虽已不复存在，但大名七师培养出的不少师生日后都成为信念坚定、经验丰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像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